国学教育的现代探索与文化建构
——评李训贵、宋婕主编的《城市国学讲坛 (第二辑)》

陈 菲[1], 龙其林[2]
(1.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05;
2. 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溯源"国学"的历时性内涵及反思其兴衰的时代背景, 具有总结文化历史、着眼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城市国学讲坛 (第二辑)》对国学内涵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 将国学教育纳入到现代化的语境中, 探索出了一条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并行不悖的教育方式; 同时, 基于对国学教育规律的把握, 该著以国学的现代化进程为观照, 主张打破学科、专业的限制, 推进国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互相促进、双向契合。

关键词: 国学; 现代语境; 教育探索; 文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 G 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408(2009)04-0014-05

Modern Explor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Studies Education and Culture Construction
—— Comments on City Forum of Classcial Chinese Studies (Vol. 2), by Li Xungui and Song Jie

CHEN Fei LONG Qi-lin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Public Management, 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 Guangzhou 510405,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racing the diachronical connot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Studies" (CCS) and reflecting on the time background of its ups and downs, the great value of summarizing cultural history and facilitating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us achieved. City Forum of Classcial Chinese Studies (Vol. 2), based on a complete explanation of CCS' connotation, brings CCS into a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and explores an educational approach encompassing both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Meanwhil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CS education, this work takes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CS as a reference, and proposes to transcend the restraints of discipline and program, and promote the mutual advancement and bilateral compatibility between CCS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CCS; modern context; educational exploration; culture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 2009-10-10
作者简介: 陈菲 (1983-), 女,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旅游教育、旅游管理与文化。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文化热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兴盛起来，人们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时，几乎一边倒式地否定、批判传统文化(即今日之“国学”)。与此同时，西方的思想文化、理论著作不断地被翻译、介绍进国内，更是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形成强烈冲击。这些舶来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开拓当代学者的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引进为我们剥离意识形态的束缚、重新回归思想文化本体提供了契机，多样性的思维范式、文化理念对研究者选择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和形成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某种参照体系，而最为深远的影响也许还在于西方思想文化理论启迪了众多民众的自由观念、激活了久被抑制的思想活力。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受西方思想文化理论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者和普通民众，也不可避免地在其身上体现出某种时代的局限性：一方面，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引入，在突出了思想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形式性的同时，也带了技术理性至上、生命体验缺失的弊病。在如今众多西化的学术论著中，我们已经很难发现独具民族风味的思维方式与生命体验，很多论著几乎成为西方思想理论的堆砌、搬用甚至是套用，中国的思想文化研究成为舶来理论的演练场。另一方面，伴随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输入，思想界和文化研究界里的西学的追随者必然大量出现，学习、借鉴乃至惟西学马首是瞻的思想和论著已经涌现。虽然一些学者已经提出重新整理本土思想文化理论，希望与西方进行文化对话，但就实绩而言并不令人乐观，长此以往必然形成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喧闹与本土文化理论的寂寞这样剧烈的反差；而更微妙却深远的影响则在于，西学的甚嚣尘上反衬的是中国民族文化自信力的衰颓和民族根基的阙如以及民族虚无感的抬头。这种比附西方历史阶段、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的现状，已与中国本土的发展历史、精神资源产生了严重的错位，有意或无意借鉴乃至套用西方经验成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追求中难以避免的陷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在西方观念的转换过程中被忽略、稀释了，从而给民主文化传播、研究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即便如此，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再来回顾国学的传播、发展和研究之路，我们仍然欣慰地看到国学发展的现状较之以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思想不断宽松的环境下，我们的国学研究和传播出现了可喜局面，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展、研究方法日益更新，传播途径也多元化。在这些弘扬国学的方式中，学校教育无疑是其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秉持“质量立校、人才强校、文化塑校、特色兴校”的使命，独创了融国学教育于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在突出能力本位、就业导向的职业特色的同时不断强化学生的人文素质，从而弥补了国内高等院校注重知识灌输忽视人文精神的沉疴。新近在由李训贵、宋婕主编的《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中，主编者将其文化触点延伸至国学的现代整理与实际对接中来。这部著作以国学的现代价值为基点，对中国国学的产生与时代精神、国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及民族精神、读经与构建和谐社会、国学与哲学修养、文史知识等方面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展现了国学文化与当代社会衔接和对译的可能途径，为国学研究与传播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和经验。编者怀着对国学的热爱与熟稔，试图寻找贯穿古今文化的内在规律，在一片喧嚣哄闹声中默默地探索着国学教育的现代方式与可能途径。

《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一书的特色首先体现在融古汇今学术原则的运用和大文化的视野。该书以国学为关照点，综合运用了民族学、哲学、文化学、文学、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不仅完善着《城市国学讲坛》系列著作中对贯通中国古今文化体系的自觉追求，而且还扩展至国学的现代转化与对接领域，以此来表达着对“自身文化血脉及其蕴含的根源性智慧的真诚体认”[1]。《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收录了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近年来举办的一系列国学讲座的讲座稿，对逐渐成为热点的国学问题作出了明晰的学术梳理，从国学文化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关系的思考到读经与和谐社会建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儒家民本思想的再审视到佛教对人生痛苦的透视及其解决的心理过程等等，兼容并包，由此构成了一个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圆融自通的国学系统。李宗桂先生通过对国学的内涵、内容、范围等进行立体式的扫描，阐释了国学的基本内涵：从第一个层面来看，“‘国学’这个词早在2000多年前的《周礼》里面就已经有了”，“《周礼》里面的‘国学’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这种含义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乃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结束封建王朝前，基本上是没变的”[2]；而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国学已经与中国古代的国学不一样了。当时，国家的学问、本国的学术就叫国学”[2]4；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学则演变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我们讲的国学，是讲经典意义、文献意义上的，是已经经过千百年历史的淘洗而逐渐形成的、经过历史检验的、共同认知的、代表民族文化主流的一些典籍，以及这些典籍所反映出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特质。这些经典就是国学的主要内容。”[2]12

在此基础上，该书通过对国学内容的整理、发展的演变、精神旨趣的厘定，从观念、材料、视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国学的现代阐释与转接。在以往，已有一些研究者也涉及到了国学与现代教育、民族文化的对接工作，但要么以西方文化的体系来观照传统文论，或者在传统文论中找到与之对应的术语、材料，这两种方法看似不同，实则均是以西方文化为本位，而忽视了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整理。即便一些学者在国学术语上作了一些整理，也仍然停留在局部层面，而难以建立起一整套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的有效平台。该书对国学的推崇和对中国文化原创性的强调，必然要求祛除西方话语的强权、弥合东西文化造成的断裂。在《读经与构建和谐社会》一节中，郭齐家先生在对现代生活的趋同化保持警惕的同时，敏锐地发现了当前文化中隐藏着的文化认同危机：“所谓文化认同危机，就是由于不再真正了解自己的传统、不再真正为自己的民族性感到自豪、不再真正信仰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或基本价值观，而导致不知道我是谁；或者不清楚自己的长处或问题；或者由于见惯了各种跨国公司或用熟了各种进口产品，觉得自己有了多种身份或跨国意识，于是会觉得新旧之间、你我之间、地域和族群、国家和跨国的都在变化不定，因此不必在乎。这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对中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社会群体和思想力量。”[3]在此基础上，作者主张通过读经的途径强化国民的精神凝聚力：“全民读经，尤其是青少年儿童读经，这是文化经典的教育和训练，是主体文化精神从自在走向自觉、从潜在走向现实、从感悟转化为创造的过程，是培育、生成、壮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3]60从这个角度出发，该书将国学历史的勾勒和驱除西化的旨趣自然地整合起来，传达了以植根民族传统、融汇中西的文化眼界，书写当代中国文化历史的意图。作者在书中所倡导的融汇中西的感悟思维方式，是一种综合吸收了国学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文化新质，以此来驱除为习惯认知所笼罩的文化碎片，重新认识已渐扭曲的国学面目，通过再现时代语境中的文化生态，揭示谬误产生和长期盘亘的文化、心理、政治、风俗等复杂原因。以国学作为基点，贯穿古今，融汇中西，借此重回历史现场与文化状态，无疑为我们理解已经远去的国学背影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介入视角和思考触点。

其次，《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一书的特点还体现在阐释国学、弘扬民族文化时对诸学科知识的巧妙运用和匠心独运的发现。通过对国学景点和文化现象的重新解读，推陈出新，在观察、分析、对比、反思、颠覆、重构上一气呵成，考辨文化史上某些重要的著作和思想，以期无限接近昔日的国学生态和思想结构，是《城市国学讲坛》的一贯特色，这在《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中同样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杜玉俭先生在《<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中考察孔子的形象时，以《论语》所载孔子及其门人的语录为例，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富有生活气息的孔子图像，这个图像的还原与之前存在着的神化孔子的行径大相径庭：“《论语》中的孔子形象和后世被神化了的孔子形象有非常大的差距。孔子在后来被神化了，被神化最多最严重的阶段是汉朝。孔子去世后的头两三百年，他的影响并不像后来那么大，因为他去世后是战国时代的开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个学派纷纷出现，虽然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其他学派对他却很不尊敬，像道家讽刺他，法家、墨家都是骂他的。一直到汉代，孔子的思想才被国家所承认，被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4] 针对孔子名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杜玉俭先生认为“执鞭”一词应作“驾车”解，而非“管理市场”之意。由此，作者更由此言深入地体察到孔子对于财富的态度，即“如果富裕是可以求到的，即使是驾车这种最低贱的工作，我也会去做。如果富裕求不到，就喜欢什么做什么了，不强求”[4] 202，这对人们习惯上接受的孔子甘于贫困、淡薄名利的形象无疑是一个颠覆。同时，人们耳熟能详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名句，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于孔子不苟言笑、温和敦厚的想象。对此，杜玉俭先生依据《论语》中的孔子与人交往时的表现，将其性格生动地揭示了出来。就孔子与学生的关系而言，他“不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而是一个幽默的、风趣的、博学的人。他跟平常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会发脾气，也会骂人，甚至恼怒的时候还跟学生赌咒，有时候也痛哭流涕”[4] 194。例如，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卫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卫国国君卫灵公的妻子南子希望见孔子一面，孔子无奈答应了。“子路责怪说不该见，孔子就在子路面前发誓说：如果我做错了什么的话，上天都会厌弃我，即：‘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好像急于表白，有话讲不出，学生又不理解他。所以，我们感觉到，《论语》中的孔子在与学生交往时，并不是正襟危坐，而是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4] 196—197高小康先生在《古典文学与传统艺术精髓》中，由宋代诗人、词人们善于描写青楼、酒旗、画桥等形象，分析出此时文学与都市之间的隐秘关系：“这时期的江南艺术精神与前面所讲的士大夫艺术精神已经不一样了，它带上了中古以来的都市文化色彩，也可以说是带上了一些烟火气、香艳气和声色之娱”，“实际上，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已经开始由中国古典时代走向商业时代了”[5]。而在分析西门庆形象在《水浒传》和《金瓶梅》中的差异时，作者指出了西门庆形象由一个破落户浪子到手眼通天的商人的根本原因，即“这就可知道有地位的商人和官僚之间的关系。虽然商人需要官僚，但纯粹是利用，因此商人的地位已经变了”[5] 186，由此揭示出两部古代经典作品背后隐藏的文化和经济语境的不同内涵。关于叙事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高小康先生通过对历史典籍的爬梳，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在经典文献中记载的胜负成败的事件中都潜藏着合乎天道与否的问题：“胜负成败背后都有这个最高的原则，具体的道义和智慧归根到底就是合不合这个最高的道义。这个‘天’不是玄虚、看不着的东西，‘天听自我民听’，从老百姓、从社会上人们的舆论中就能够知道什么是天道”，“历史是按照天道这种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发展的”。[6] 138而对于那些与天道不符的事件，“在历史上就逐渐形成一套正史的叙述方式，即以合乎自己观点的方式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正史的故事，因此正史就有正史的故事。一直到现在，我们讲历史还是受这种正史的影响，要把历史讲得非常地合乎一个道理。比如说，我们喜欢讲我们整个历史的发展最后终归要合乎历史规律，历史规律就是最后发展成一个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所以，合乎这个大一统规律的就是好的，不合乎就是坏的”[6] 140。于是，中国文化史上关于历史的叙事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正史的想象，认为历史符合一定的规律而发展着；一种是伊甸园想象，即历史如同犹太人的《旧约》中揭示的亚当、夏娃们被逐出伊甸园，不断地走向愈加糟糕的地步。关于第一种历史叙事，中国的历代皇朝修史即是此类；而对于第二种历史叙事，人们研究得并不多。正因为这样，高小康先生对于非正史的历史叙述倾注了自己的热情，认为那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中国式悲剧色彩的叙述方式。作者以《史记》中的著名将领李广为例，认为他虽然为人清廉、英勇善战，但是“他参加的大战役几乎没有赢过。他的确很勇敢，也很有智慧，但是他的战功却非常少”[6] 142。对于这样一位非常矛盾的人物，《史记》却忽略了李广的缺点而聚焦其品质、武艺和胆略。原因何在？在高小康先生看来这实际上是司马迁的叙述态度问题：“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实际上有着很多的不公正，因此他才发愤著书，就是要把不公平写出来。不只是他一个人如此，历史上许多人物都是觉得世道不公平才发愤写书的。所以，司马迁想通过这个故事表现历史不公正的那一面。他的这个叙述，就构成了历史叙述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另外一种叙述方式。这就不是一种天道的历史观,而是一种悲剧的历史观。”[6] 143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重新审视,不仅推翻了前人在此问题上长期陷入的认识窠臼,而且生动地再现了不同时代中相似或同构现象、心理情感的谐振的可能性。该书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进行破解,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反说,与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理念、审美习惯、研究维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作者的兴趣显然在于凭借对惯常结论的重新认识力图为重绘中国文化地图寻找到新的文化生长点。专家们以其渊博学识、犀利的学术眼光,在一般读者习惯的文化意识和结论中发现了隐藏已久的真实,以一种罕见的文化胆识执着于国学面貌的重新发现,进而还原其历史真我。

再者,《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一书对于传统思维的现代转型途径和如何在中西融汇中开拓国学的新空间的分析也极具学术内涵和创见。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在激荡的现代文化语境中面临着复杂的转型与蜕变,如何总结其成败得失、昭示前路成为学界有识之士的自觉追求。该书在对中国数千年文化的追溯和国学现代化转型成果的考辨中,总结出几个可能途径和方式:第一,让青少年儿童诵读中国文化经典。在《读经与构建和谐社会》中,作者发现了颂习传统文化经典的可贵之处在于让人们“从小汲取营养,从小学会做人,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和民族精神”[3] 59,“中华文化经典培育训练了中华儿女,可以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软实力,增强我们的国力”,“修身从读经开始,形成全民族的阅读风气,首先是营造阅读经久不衰的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风气”[3] 60。第二,在如何进行国学的学习与思维方式的对接上,主张以文学和艺术相互融合、共同促进的方式进行。在对文学与艺术关系的分析中,伍巍先生从源头考察了文学艺术的关系,认为“文学艺术既然都源于生活与生产劳动,那么,它们之间就不可能是割裂的关系”,“不但艺术与文学之间是相互沟通的,各种艺术门类之间也是相互沟通的”[7]。国学文化“只是一个平台,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在这个平台上攀登,从事艺术、从事理工医农,那将会有更全面的发展”[7] 232。第三,主张通过在贴近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了解、熟悉和运用国学文化,从而使之与当下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赋予其强劲的生命力。在李宗桂先生看来,“国学并不是一个僵化的、死亡的东西,而是具有生命力的,和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和我们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民族精神紧密相关的东西。它是活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影响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活生生的东西”[2] 11;即便是围绕国学的有关论证,从本质上看也是“反映了中国该走什么道路,即该不该实现现代化、怎样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这样一些基本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实践问题,是影响我们社会向前发展的问题。”[2] 11-12

杨义先生在分析《史记》产生的时代背景时曾说:“司马迁这部史书的结构和它的体例,实际上反映了秦汉大一统的魄力,没有这大一统的时代魄力,就不可能产生司马迁的史学结构。”[1] 114李训贵、宋婕主编的《城市国学讲坛》系列著作也同样鲜明地体现出时代魄力对于文化经典及其经典的规约作用。《城市国学讲坛》系列著作所着力的国学文化的倡导、国学教育的实践以及国学思想的现代对接,亦是中华民族复兴旅途中产生的对自我文化原创性的诉求与民族想象的反映。处于全球化影响不断增强、传统资源颇有断裂之虞的当下,我们更能从中体味到振兴民族文化、重铸国民精神的责任意识与天下情怀。钱穆先生曾经如此强调国学与民族振兴之关系:“夫古人往矣,其是非得失之迹,与夫可镜可鉴之资,则昭然具在。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继自今发皇蹈厉,拨荆棘,开康庄,释回增美,以跻吾民族于无疆之休,正吾历古先民灵爽之所托凭也。学术不息,则民族不亡。凡我华胄,尚其勉旃!”[8]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国学讲坛》反映的不仅是一个关于国学文化的历时梳理与现代转化的学术问题,更是中华文化如何立足传统、发掘历史、镀亮自我,进而进行文化再创的精神问题,还是当代学人对中华民族历

(下转第35页)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他还有相当多的诗歌奇崛险劲，明显带有韩愈的风格，如《赠刘仲宪》，全诗一千余字，押入声韵，一韵到底，奇字险句迭出，是明显的学韩有得之作。《石鼓诗》更是直接学习了韩愈的《石鼓歌》：

粤自鸿蒙剖玄秘，天祚有熊炎帝继。侯刚覃思神与凝，摹写三千入书契。苍姬一变史籀出，鲸攫鳌呿凤鸾逸。嬴秦自帝不古师，遂使奸斯愚叔世。当时玉筋天下独，尔后争奇古文弃。末流诸子相祖述，刓朴遗淳趁姿媚。我尝慨此愧疎浅，一髮空危万钧系。竭来庠宇睹石鼓，玉立俨然三代器。细思伊始将安庸，或谓宣王章猎事。且疑且信邈难诘，日月群阴欲食既。半为雷电下取将，仅余二百七十二。贞坚不堕劫火灰，苍古犹含太初气。世间钟鼎瓦砾如，只辞千金未为贵。昌黎作歌恨才薄，坡老来观惜时异。区区流转又几朝，终不能忘见天意。若令好事堪把玩，攘窃空应穷万计。平生漫有博物心，迫视不能详一字。沉吟独立西风前，乔木荒烟日西坠。

学习韩诗，与他在散文创作上学习韩愈的审美追求是一致的。论者谓其“风致潇洒在元和、长庆之间”。[①]实际是指他对中唐白居易、韩愈二家诗风的兼取，并不专指学习元白。总体而言，张养浩的诗没有他的散文的成就高，这可能与他更致力于散文的创作有关。

①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本第750页。

（责任编辑　潘志和）

（上接第18页）

史进程的宏大思考和对转型期中国文化走向的人文关怀，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杨义. 感悟通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李宗桂. 国学与时代精神的若干思考[C]//李训贵，宋婕. 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3]郭齐家. 读经与构建和谐社会[C]//李训贵，宋婕. 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4]杜玉俭.《论语》中的孔子形象[C]//李训贵，宋婕. 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5]高小康. 古典文学与传统艺术精髓[C]//李训贵，宋婕. 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6]高小康. 叙事与中国文化传统[C]//李训贵，宋婕. 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7]伍巍. 文学与艺术融谈[C]//李训贵，宋婕. 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8]钱穆. 国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责任编辑　潘志和）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